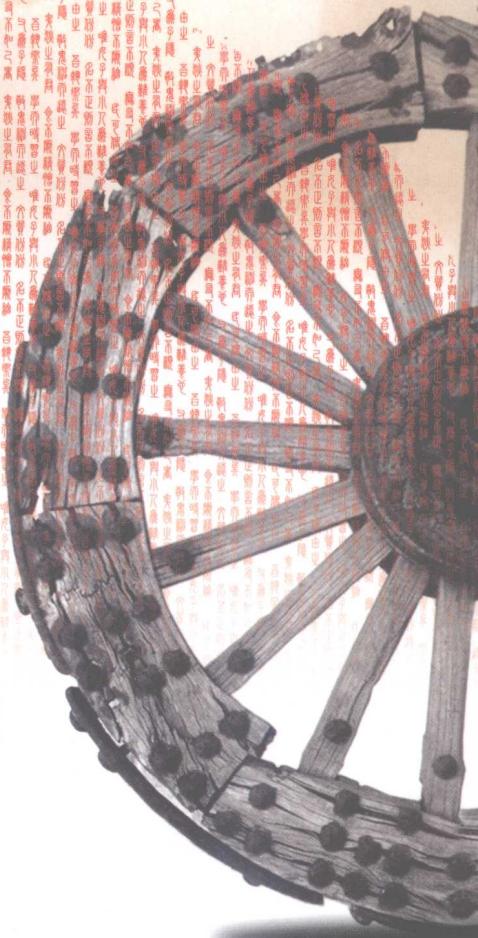


孔子原来这么说

沈善增 著



孔子说

原来这么

沈善增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孔子原来这么说 / 沈善增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善增读经系列)

ISBN 978 - 7 - 208 - 07755 - 3

I. 孔 … II. 沈…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098 号

责任编辑 黄 亨

封面装帧 王震坤

· 善增读经系列 ·

孔子原来这么说

沈善增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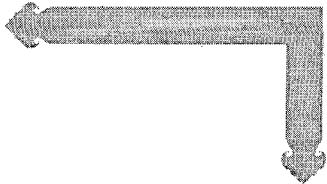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81,000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500

ISBN 978 - 7 - 208 - 07755 - 3 / K · 1427

定价 23.00 元



出版前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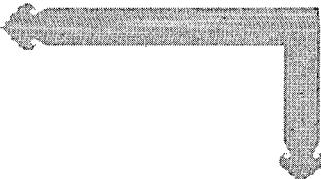
本书是我社推出的《善增读经系列》的第四本(前三本分别是《还吾老子》、《老子还真注译》、《老子走近青年》),是作者构筑中的《还吾论语》工程的一个重要的子项目。

如作者沈善增的《还吾庄子》、《还吾老子》一样,本书是其继颠覆《庄子》、《老子》旧注以后的一部颠覆《论语》旧注的力作。它用深入浅出的串讲形式,选取了《论语》中耳熟能详、脍炙人口,而又被作者认为遭受两千多年严重误读的十一段章句,进行了详细甄读。它们包括:“學而时习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父为子隐”、“敬鬼神而远之”、“文质彬彬”、“名不正则言不顺”、“无友不如己者”、“夷狄之有君”、“食不厌精”、“民可使由之”、“吾执御矣”等。通过甄读,颠覆旧注,同时引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深入探讨了孔子的教育观、政治观、法制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交友观、外交观等;阐述了孔子创立的“师文化”与他的民本立场、民主理念在构建中国人的深层人格,在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历史、文化、人脉未曾断裂的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对人类未来健康发展的伟大意义。对造成《论语》误读的原因也多有涉及和分析。

作者由此认为,“就反孔来说,如果反的是由皇权专制塑造出来

的精神偶像孔圣人，批的是注出来的伪孔子，是完全正当的，完全必要的。但若到今天，还执著于造出来的孔圣人、注出来的伪孔子就是真实的孔子，拒绝以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重新研究、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孔子，那就不免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之嫌了。”所以，“今天的尊孔，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尊孔，是通过‘五四’反孔的否定之否定的尊孔。尊的是孔子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人文精神。因此，今天的尊孔派可能与历史上的尊孔派有很多观点与价值取向的分歧，而与‘五四’的反孔派倒有更多共同语言。”应该说这也是本书出版的一大意义所在。

在本书完成以后，作者又撰写《“和其光，同其尘”新解》一文，考虑到此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理论的阐释，与理解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意义，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以飨读者。



开场白

与我十年前动笔撰写《还吾庄子》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国学应该说已经很热了。尽管学术界对“国学”这一名称是否合法尚有争论，对青少年要不要读经（指的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如《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争论更加厉害，但大众对国学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忱，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希望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吮吸乳汁，相濡以沫，来滋养今天美好的和谐社会。因此说，“国学热”，作为“中华文明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应运而生，应日益昌盛的国运而生，应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时代需要而生，也是应世界新一轮游牧文化向农耕文明同化的历史趋势而生。（今天的游牧文化就是工业游牧文化，我将在以后论述这一点。）

促使国学热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纪连海固然功不可没，倡导新道学的胡孚琛、提倡儿童读经的蒋庆、呼唤当代新道家的董光璧，还有余秋雨、金文明，郝铭鉴与他主编的《咬文嚼字》等，也都有很大的功劳。就是从根本上反对有“国学”这一说的，如舒芜，也因为他的反对意见，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鉴别能进一步深化。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热，其实也不是一日之功。就像烧水，沸腾前的加热，都是为沸腾这一刻做准备的。能看到的是沸腾时的泡沫翻腾，其实没有沸腾的水也聚集了足够的热量，沸腾只不过把热量变成可以看见的现象。但我现在关心的，不是在国学热的形成过程中谁的功劳更大，谁的见解更高超，我关心的是国学热不是如风吃过，热闹一阵，而是能将热能转化为持续的推动力。就像蒸一

碗鱼，锅子里盛了半锅水，蒸架上放了一碗鱼，盖上锅盖，加热烧水，水沸腾了，冒白汽了，立刻揭开锅盖，熄了火，鱼有没有蒸熟呢？蒸鱼需要水先沸腾，这不错，但水沸腾了是不是能说明鱼已经蒸熟了呢？但中国的事情往往热过了，事情就算成了。一些小事无所谓，就我的记忆而言，光健身方面，就有甩手热、喝红茶菌热、打鸡血针热、喝凉开水热、太极拳热、气功热、练功十八法热、木兰拳热，等等；但如果国学热也是昙花一现，就成明日黄花，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且不说国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的正在开发的巨大的精神宝藏；就说今天这国学热实在是来之不易。就在十年前我动笔撰写《还吾庄子》时，老子、孔子、庄子（以出生年岁为序），还是戴着各种帽子，至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的老古董。所以，对我说要还《庄子》的本来面目，“一千七百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是一个被注出来的伪庄子”，遭遇最多的问题，除了“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我当时就回答说，“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很有意义”。说“没有意义”，没有我认为的什么实用意义，或者说，我怕过分的强调《老子》、《论语》、《庄子》的实用意义。《老子》、《论语》、《庄子》我认为对做生意、炒股票、处理官场、职场关系等，就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现在有很多讲老子、孔子、庄子思想的实用意义的书、讲座，说得都不错，但其实去掉其中引用的老子、孔子、庄子的语录（往往还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错误引用），所讲的道理在其他的书里也可以看到，老孔庄的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包装。中国人因为传统悠久，也因为是农耕民族，历来尊重传统，所以对写书的、讲演的引经据典，往往就肃然起敬，觉得他的话一下子很有道理、很有文化，但从接受学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可取的。

对此，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有深刻教训的。“文革”前夕，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出现了庸俗化倾向，当时就编了一本书，叫《学习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里面都是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辩证法，解

决工作、生活中实际问题的例子。不是说这些例子不对，也不是说对立统一规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以为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可能出大问题了。以后林彪编印《毛主席语录》，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那就与集体催眠、“文化大革命”有直接的联系了。党内当时有理论家注意到了这个苗头，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倾向，在文革中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被斗得要死。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学习、普及时的庸俗化倾向有特别的敏感。老孔庄的伟大，决不在于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观点、结论，甚至某一句话，像数学公式、物理定理一样，可以现成拿来一套，就解决实际问题。说“很有意义”，就是老孔庄的思想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今天建设和谐社会，老孔庄思想就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学习老孔庄思想，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素质。

举个例子说，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打倒孔家店”以来，就一直是孔子桎梏人心的一条罪证。其实，这段话是对士大夫说的，礼是对士大夫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所以，孔子又说：“礼不下庶人。”这句话也一直是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罪证，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对不是士大夫的普通人，不要有那么多礼义的要求，但你要做官，掌握一定的权力，就一定要严格约束自己。今天，对党政领导干部就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普通老百姓就不用，当然，你如果以党政领导干部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是好的，但你不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党政领导干部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譬如，我们小百姓帮人办事，事情办成了，别人送点礼，给点钱，你接受了，没什么。领导干部给人办事，办成了，别人酬谢他，他接受了，就不可以，甚至刑事犯法。我看到过一个材料，有个管基建的乡干部，项目做成了，验收也通过了，承包商送他钱，他开始不拿，但后

来知道承包商在这个项目里要赚得多得多,给他的只是个零头。他为搞项目没少吃辛吃苦,但只拿些清汤寡水的工资,他心里不平衡了。他想,我不拿,这钱还是落进承包商的腰包里,我拿了,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穷人。所以,他后来就拿了,也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慈善资助,但终究东窗事发,因受贿罪而锒铛入狱。他觉得有些冤,在他角度来说,好像振振有词,但他为什么拿出一部分赃款来慈善捐助呢?说明他心底里知道这是“非礼”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摆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士行规矩的约束,使他犯了罪,但孔子建立起来的这套士行规矩终究还是减轻了他的罪行,也为他犯罪以后迷途知返而不是破罐子破摔提供了条件。

再说个正面的例子,我有个当年农场的同事,现在是上海某局的党委书记,名字我就不说了,就称他 K 吧。六、七年前,他在当上海某县县委副书记时,我的另一个在外贸公司做总经理的农场同事 W 去他家里看他,回来对我用非常惊讶的语言描述他的清廉。说他住三间平房,还是水泥地,湖绿色涂料刷的;家具很简单,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结婚时凭票买的。两个儿子读大学,他给的生活费很扣。W 说,他带去一点礼物,两件衬衫,K 的老婆还不肯收,W 要 K 说一句,我们是什么关系,我的礼物可不可以收,礼物才收下了。后来 K 调到上海某局来了,我看他,说起这事,他说,我们做干部的,凭良心说,生活总比一般老百姓要好多了,还要贪什么呢?孩子还是从小让他们过得苦一点好,他们比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要优越多了。我对他们要求严格,他们现在都很争气。

这就是孔子提倡的“贫而乐,富而好礼”的精神。我们今天尤其需要继承、发扬我们民族古代圣贤的这样的精神。

我看到有反对研究国学、反对青少年读中国古代优秀经典的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你们把老孔庄的思想说得那么好,为什么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苦难深重,到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天,中国要富强、中华民族要复兴,靠老孔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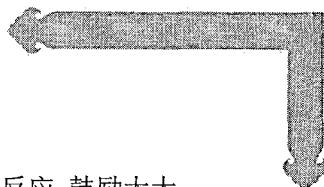
的思想行吗？这样的质疑，到今天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我就不展开辨析了，只说一点，根据我对老孔庄本意的考证、认识，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时期，都是老孔庄思想比较得到统治者认可、实行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都是老孔庄思想实际受到遮蔽、歪曲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在《还吾老子》、《老子走进青年》等书中有论述，在这次讲解《论语》本意时我也会谈到。

但十年前我写《还吾庄子》的时候，对老孔庄思想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定位、这样的质疑，好像是占据了主流话语，理直气壮。所以，除了极少数的搞古典文学研究的老先生，如当过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徐中玉先生，鼓励我，认为我写出一本《还吾庄子》，比写十本长篇小说还要有价值（当然这也说明我的小说写得比较差）；其他人都认为我这样不务正业，放着赚钱的小说与更赚钱的电视剧本不写，去写可能出版不了、也可能出版了还要赔钱的《还吾庄子》，是脑筋搭错、走火入魔了。到今天，我好像有先见之明了。就为了使我自己能保持一份先见之明的好感觉，我也希望国学热能是一种真正的热，能把鱼蒸熟的热，不要被反对国学的，认为中国不能有国学、不该有国学、不配有国学的人不幸而言中。

但就我看来，“国学热”被不幸而言中、方兴即艾的概率很大。为什么？因为用来加热的柴不行，都是些湿柴。湿柴生火，你不想让火熄，火也很容易熄。我说的湿柴，指的是从古到今，一两千年来《老子》《论语》《庄子》等或权威或流行的注释本。这些注释本错误在我看来是非常严重的。《还吾庄子》只还了《逍遥游》、《齐物论》两篇（今本《庄子》共有三十三篇），以前注译，《逍遥游》平均两句中一句以上存在问题，《齐物论》平均三句中将近两句含有错误；《老子》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有错，而且整篇结构几千年来被人误读了。今天有好多人出来批评于丹、易中天，说他们哪儿说错了，哪儿是戏说，什么说法庸俗化了，甚至说“戏说文化是犯罪”，其实，他们言明说的是他们的读后感，于丹说明是“心得”，易中天的“品”，品赏回味，也就是读后感，

读后感是完全可以自己怎么感就怎么说的，只要他说出来有人听，写成书有人买，“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读后感来说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国学作为一门学问，靠些读后感，哪怕是很精彩的读后感，恐怕是建立不起来的。于丹读《论语》心得，在我看来就有很多错的地方，而错误中很多是因为采用了错误的注释造成的。当然，于丹并没有表示她从此要成为一个国学研究者，她只是一个国学票友，为普及、推广、弘扬国学摇旗呐喊。这也很好。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国学票友。问题是研究国学的专家，如果也是在错误的注释本的基础上提倡读经、捍卫经典、发表见解、构建体系，那么，就像在沙滩上造房子，要房子不倒，也不容易。现在有人从今天的国学热，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曙光，这希望正是我所希望的，但就今天国学热的现状来看，从国学专业人士的素养准备来看，说这句话还早了点。新儒家如果从康有为算起（这个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一出手就写《新学伪经考》，为变法制造基础理论，有认为是新儒家的发端），有一百多年了，新道家从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算起，也有年头了，但都还很难说已成气候，因为他们都难以回答一个问题，说“新”，到底“新”在哪里？不能说后来发生的一定就是“新”的，也不能说引进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概念对儒家、道家思想进行解释就是“新”的。然而，我认为新儒家、新道家、新道学、乃至新经学都是应该能成立的，而且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因为对《老子》《论语》《庄子》等原典的注释变化了。如果新的注释能够确立，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儒家，是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异化，道家是对老庄思想的曲解、异化，那么，还孔子思想本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就一定是新儒家；还老庄思想本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家就一定是新道家；还《老子》《论语》《庄子》等经典本意的学术一定是新经学。所以这希望、这曙光不是能等来的，而是要我们去争取的，也是可以去争取的。

然而，从十年前开始的先秦经典还真工程，虽然《还吾庄子》的第



一卷与《还吾老子》已经出版，得到的学术界和读者的反应、鼓励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却感到越来越难。按说通过十年寒窗的苦读，对先秦的语境熟悉多了，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找到相关的印证材料，应该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之感，确实在具体问题上，我也常常感到了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的愉悦，但在整体上，我是真正体会到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正如俗话所说，初学三年，天下可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虽不至于寸步难行，但可以说有点步履维艰。因为我越读越感到老孔庄思想的博大精深、纯粹高远。他们是深入浅出地言说，而我们对浅说的把握，既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可能认指为月，使人执著于字面义，而不能由此进入思想的奥义。所以，指出前人的注译错误，在今天的我看来还是容易的，而要使我提出的新注译做到“信、达、雅”，既在语意层面上可靠，又能引导读者去体会揣摩语辞背后的不尽之意，则是非常困难的。

就以我三年前就开始着手做的《还吾论语》的工作说，之所以到现在还迟迟不能动笔，就因为我越读越觉得有更多的书需要精读，有许多课必须得补上，而且不是一般的补课，是要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琢磨过，我这才知道工程浩大，取巧不得，我原来靠“好读书不求甚解”积累的一点文史哲知识根本不管用，而现在的阅读速度、记忆力、持续工作的精力、思维的敏感与活跃度，都大不如前了。

工程浩大，是由《论语》这本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到宋代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定“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名目，《论语》的地位才逐渐超过《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成为儒家第一经典，而在孔门弟子编定《论语》的当初，本来是作为读经的辅导教材的，所以《论语》又有“传”的别名。“传”的地位超过“经”，朱熹固然功不可没，但如若没有文化心理的深层原因，就是皇帝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论语》地位的超越上升，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中华民族的教育观有关。至少从西周立国、周公制礼以后，教育就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官

办学校教育的对象是贵族弟子，以培养合格的贵族、政权接班人为目标，贯彻的是精英教育的理念。精英教育，以品德素质教育为主，以知识技能教育为辅。孔子办私学，虽然受教育的对象扩大了，普通士人、农、工、商民的子弟都可以来学，但精英教育的理念，孔子还是全盘接受，他是要使民众获得精英教育的权益。孔子把品德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为“君子儒”，只求知识技能的就是“小人儒”。要有效地进行品德素质教育，就要采用与知识技能教育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教育学生，是有教材的，六经（前述五经加上《乐经》）就是教材，和官办学校采用的教材大同小异。但学到六经所载内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够举一反三，运用于实践。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学习要学立场、观点、方法，其理念，可以追溯到老孔庄。在立场、观点、方法中，老孔庄认为方法是最重要的。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就可以超越“彼亦一是非，此亦已是非”的立场局限，也可以不受经验、重言（权威之言）等具体观点的束缚。但方法的教学比具体的知识技能的教学要难得多，因此，孔子采用的方法，是学生和老师生活在一起，学生听老师阐发教材的观点，听老师运用一些观点、原则分析现实问题，学生提出疑问，老师来回答，老师和学生共同讨论一些问题。正因为这些内容是教材上没有，而对造就君子儒来说更为重要，所以尽管孔子在世“述而不作”，一去世，他的弟子门人就替他作了。与《论语》相似的还有《礼记》与《易大传》，都是弟子根据记录或回忆整理的孔子教育的精髓所在，说“精髓”，是可以从中体会到孔子所持的立场（基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民本立场）与思想方法。而《礼记》讲礼，《易大传》谈易，比较专门，《论语》是综合性的，所以它更利于普及推广。

在《还吾庄子·齐物论·题解》中，我对“论”“议”字作了一番考证，简而言之，“论”与“议”，是依止于“伦”与“义”而来的。“论”是“伦”之言，“议”是“义”之言……“伦”和“义”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客观规律的两个方面的认识。“伦”反映了规律的先验性、第一性、永恒

性与不可抗拒性；“义”反映了规律的逻辑性、可利用性、具体可变性与有效性。“论”说的是“伦”，所以它只是描述与评价，即指出意义，不对言说对象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因为先验性、第一性、永恒性是无法通过逻辑来论证的，对它只能作为公理全盘接受下来。故而，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孔子及其弟子门人的言谈辑录称为《论语》。而“议”说的是“义”，就一定要进行逻辑思辨，探讨义理必须遵守逻辑规则，且“议”的指向也很明确，要作出决定，付诸行动，以求获利。至于“语”，当时是指因问而答，含有教导的意思。其时把这本孔子等人的言行结集定名为《论语》，是指里面所记都是一些结论性的教导性的话。

《论语》地位的提高，表明了在皇权专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以“代圣人立言”的方式，来阐发他们的独立思考成果的自觉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也是老孔庄的重在思想方法的教育理念的自然延伸，本无可厚非。观点的具体语境的缺失，正为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所以子学（包括《论语》注释在内的《论语》学其实是儒学中的子学）是中国学术中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第一是把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阐释、发挥混同乃至取代了对原著本意的严谨的求索。因为经典的结论、观点不容讨论，所以就各取所需，任意解释，为我所用，致使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严密、考证周密、方法科学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难成气候。

其二，造成了孔子只有一些睿智的哲思，而没有博大完满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假象。据我迄今为止的研究心得，孔子是有哲学思想体系的，其哲学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春秋》、《易大传》、《礼记》中，所以，要对《论语》中的语录正确解读，必须精读《春秋》、《周易》、《易大传》与《礼记》。尤其是《周易》，可以说是中国最深奥、最神秘、最难解的一本书，我本来是想绕过去的，现在看来绕不过去，非但绕不过去，不能绕过去，还可能要写一本《周易摸象》。就是写不成《周易摸象》，

以准备写研究专著的态度去啃《周易》，才可能对《周易》与《易大传》中体现出来的孔子哲学思想有比较深入、正确的认识。但这样一来，完成《还吾论语》的时间就要大大推迟了。

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有关方面提供机会，要我把酝酿中的《还吾论语》里选出几条大家比较熟悉的，而我认为本意受到严重歪曲的“子曰”（孔子语录）来说一说，我欣然答应。如果大家听了我的解释以后，能感到，哦，假若孔子这句话的本意真是这样的，那孔子的思想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接受的更要高明得多，或者我们过去对孔子的不好的印象，完全是因为误解；从而感到中华文明其实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先进、要辉煌、要博大精深，身为中国人，其实有继承这份精神遗产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如果把你对孔子思想的新感受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的孩子，让他们对我们中华民族圣贤的思想产生兴趣、产生好感，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根据我撰写《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的经验，在写作过程中，直到出书以后，还会发现前人注释的错误被漏检了，所以，现在所说的，在《还吾论语》中可能会有修改。欢迎大家对我的解释提出批评，以帮助我更好地弄清孔子的原意。

1 出版前言

1 开场白

1 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学而时习之”章句甄读

23 亲者严，一大难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句甄读

48 为民争个辩护权

——“父为子隐”章句甄读

72 中国式的宗教情感

——“敬鬼神而远之”章句甄读

93 两条礼教路线

——“文质彬彬”章句甄读



107 孔子要正什么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章句甄读

134 交友之道

——“无友不如己者”章句甄读

152 有德才有和善外交

——“夷狄之有君”章句甄读

170 这才是食文化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章句甄读

203 领导准则

——“民可使由之”章句甄读

218 大气的驾车人

——“吾执御矣”章句甄读

224 附录：“和其光，同其尘”新解